

高端对话:打造升级版中国市场经济系列探微

高端对话:打造升级版中国市场经济系列探微(之一)

建立中国(上海)自贸区,打造市场经济中国版本的伟大探索

——本报主编管益忻教授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部长对话

(上接 01 版)
五、不再停留在政策优惠上,全力推进改革与制度创新

管教授:而且他不再是过去的实施“优惠政策”,而是一次制度创新的大发展。

魏部长:以前,邓小平同志讲的做十四个沿海特区,几个优惠,特殊优惠,这次已经不是了。因为国际环境变了,国内也变了,当初的改革和现在的改革不一样了。现在的改革已经是进入深水区的改革,涉及到经济利益层面的改革,制度的改变。所以这个要把它体现出来,要对上海自贸区有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

管教授:是否可以这样认识和理解,我想我们 35 年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资源配置一次又一次的升级换代。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办特区,开始摸索资源配置升级的积极形态,摆脱计划经济束缚,“杀出一条血路来”,找市场经济的方向,这是第一次;后来到了九十年代初,92 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正式开放市场经济“春天的故事”的大门,这再一次升级是一次正式开始向市场经济制度迈进的突破;第三次就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市场经济从国内迈向国际, 开始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办事了。现在就更不一样了,不再是单单加入 WTO,而是实现实施 APP 全球化资源配置了。

魏部长:我参加了部分 WTO 谈判。当时,大概是 2009 年吧,在中央党校举行了一个 WTO 的培训班, 主要讨论入世利弊多,结论是利大于弊。当时主要担心遭受冲击两个产业,一个是农业,一个就是汽车。现在证明农业和汽车价格非但不收影响, 而且是发展得更快了。我们做了个统计,加入 WTO 之前中国外贸的发展的十二年中,平均每年 10%,加入 WTO,2001 年到 2011 年十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年平均增长 20%以上, 一个国家连续十年有 20% 的经济增长,很不容易。你像我们的纺织品,加入 WTO 之前,想要出口要遵守纺织品和纤维贸易协定,出口难得很。衬衣、毛线衫、裤子都叫纺织品和纤维,包括我们各式各样的毛料, 这些想要出口都要有主动配额。主动配额就是你今年想要出口到美国,人家新西兰可以出口到 20 万件,你只能出口到 2 万件,这就叫主动配额;还有一个被动配额,被动配额就是说人家美国订给你的订单,有可能不是 2 万件,有可能只是一万五千件,那你只能出口一万五千件。这种主动配额和被动配额使中国的纺织品的出口贸易长期受到压制。但进入到 WTO 之后,像井喷一样,中国的纺织品有了几百亿件的出口。在这当中,我们要批评美国人,他应当做 WTO 最大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但是他一看到中国加入 WTO 以后,得到了比美国更大的利益,就把 WTO 停下来了。WTO 是个多边的,但是 WTO“多哈回合”,十几年美国都不去推动。WTO 的前任干事长拉米上台,做了两届也没做成,为什么?因为美国没有政治意愿,他认为再推动“多哈回合”会有四千到五千亿美元的贸易增量全部会被美国接手。美国得不到好处,但是美国又不能说不推动多边, 因为它是世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于是,美国把多边放下,搞 FTA。FTA,就是我们说的双边的自贸区谈判。最早识破美国这一招的是谁?韩国。所以韩国就争取第一个和美国谈 FTA。韩国不仅和美国谈,和欧洲也谈 FTA,跟我们中国——中韩自贸区也在谈,他也加入了日韩谈判以及 TPP 谈判。韩国的用意就是,在目前世界贸易体系、多边贸易体系停滞的情况下,FTAA 是唯一的

双边和区域性能够获得盈利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几个都是 WTO 的, 我和你谈关税减持,我有 500 种商品,你有 400 种商品,都是零关税。也就是说经过谈判你给我零关税政策,我也要给你零关税政策。如果说在 WTO 谈判中,我和你双方谈好了这些货品的协定,而第三方 WTO 成员虽然没有参加这个谈判,他也必须同样享受这个协定的有利条款,在 WTO 条款中所有成员要实施国民待遇。WTO 体系下,任何国都要享受我享受的。但是 FTI 就不一样,我和你谈了协定以后,这份协定只能我们两个享受,其他人不能享受。比如说我国和新西兰谈 FTA,那个时候是五个第一吗;新西兰是第一个承认我们市场经济地位, 第一个同我们签 FTA 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才有新西兰奶粉进来的。当然我也参与了我们和澳大利亚的谈判,2005 年 3 月陪曾培炎副总理去的,但是由于服务贸易到现在都没有谈下来。

管教授:核心的一点:WTO 是一视同仁, FTA 是一对一的。

魏部长:或者是区域性的, 比如说两三个,比如说两个一对一的,或者是一对几,但是就不是所有成员的。所以 TPP 原来是四个,后来改成了九个。TPP 有些条款就是遏制我们的。而且 TPP 最近又做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前九个成员有权否定后面的新成员的加入——就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一样,制定新的规则,遏制新的成员参加。所以



中国以后要参加的话就难上加难。这是美国想出来的一个策略, 由此可见美国是很讲战略的。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战略,更多去提出一些对今后的战略性的建议。美国智库在这方面是很厉害的,比如彼得森研究所,他提出来人民币被低估了 40%。虽然后来我们亲自去找他,他也承认他的计算有错误,但是他的报告,经常被美国两党、美国国会拿来攻击我们中国。彼得森研究所是美国很著名的一个智库,领衔人物叫伯格斯滕。

六、发挥智库作用,多出战略“绝招”
管教授:我们《经济学家周报》也正在考虑同一些著名的具有高端视野、大战略思维的国内、国际智库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甚至直接组织一些重大课题研究,像日本野村、美国哈佛等都正在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内,这个“彼得森”我们也可以找它。

魏部长:所以说智库的作用很重要,像这次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充分发挥智库、思想库的作用,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战略发展思想。更急需做到的是,智库要“出招”,要给中央出招,不是出一般的“高招”,而是要出“绝招”。你看彼得森研究所就给奥巴马出了 TPP 这个何等重要的“绝招”,这个是不容易出的。

管教授:您刚才说到美国人好从战略角度上分析问题, 解读现实, 这个问题极其重要。我认为毛泽东的兵法——毛泽东善于外线作战的战略理念, 非常值得我们用到实战中来, 用到国际关系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策划,设计上来。毛主席还有林彪、粟裕打仗,经常从内线打到外线去。其实,邓小平办特区,就是从内线打到外线去。这次,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决定建立中国(上海)自贸区是又一个由内线打到外线的战略设计和部署。您看您刚才说一开始我们进入 WTO,进了以后美国感觉到吃亏了,它就搞一个 FTA 架空我们——我们办上海自贸区这也是打到圈外面去了,也是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是变内线攻势为外线攻势。这些是军事上,战争年代屡试不爽的战略战法,在今天,许多领域好多战略设定、策略设计和运作上完全可以加以运用,您刚才说彼得森出这个点子,也有这种做法的影子。

魏部长:钓鱼岛事件,实际上是美国五十年前做出的一个针对中国的战略安排。东德西德、朝鲜问题、中东地区,包括两伊战争这些都是他们战略策略的一部分。他们的战略还有多种选择, 人家告诉我自从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美国智库提了好多种方案摆在那,怎么撤,撤多少,奥巴马要不要出访一个国家到议会演讲或到大学演讲等等, 他们都有很多方案备选。而我们就不行,这就是差距。

管教授:我有时候想,应该有几个战略的智库,也应该有点竞争,要出有用的、大的“招数”。

魏部长:我以为,作为智库,首先要“出招”,然后出“绝招”,最后还要“解惑”。领导人有时也有“惑”的,你要给他解释清楚。老百姓也有疑惑,地方企业也有疑惑的,你也要给他们作出解释。比如有人说我们的对外援助太多了,还有人认为我们支援非洲是“新殖民主义”,这些都要解惑。韩愈《师说》里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出招、解惑以后要干什么? 指路——给政府指路,给企业指路,给老百姓指路, 这是你智库最关键的一个功能、职责。所以我不太同意“智库是解读政策”这种职责定位,智库应该要引导政府,制定政

策。比如说,北京市地铁售票要增加,不要让政府先出面,先让智库出面,谈成以后政府再出面。不要让老百姓把火、怨气全都归于政府。但是我们现在这一块还不行,现在我们的智库只出一种方案,这种方案实施的时机、掌握的力度要领导人自己去拿捏,这不是给领导人出难题吗? 所以领导人希望——或者说,领导人应该希望有智库先给做好功课,而后亲自出马,不要仓促上阵。为什么这次十八大报告这么重视发挥智库的力量,这么呼吁要多听智库的声音。我们要提高我们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多元化,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多元化。多听听也有好处,作为一个领导者,各方面都听一听对他的决策是有好处的。

管教授:前年年底,我作为经济学家去了一次缅甸, 选择皎漂作为缅甸仰光的替代港口。这是从(西)实兑港,(东)土瓦港相比较中,最后选定作出决策的。仰光港口淤积,已经不行了, 他们想把皎漂办成像我们深圳那样的特区, 这就都涉及到关于整个缅甸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了。在那里,我们为他们设立了一个缅甸经济战略发展金三角。

魏部长:我以前在商务部是分管金三角的那个替代种植项目的。

管教授:我说的不是那个金三角,我说的是从缅甸的皎漂港到仰光,再到新的首都内比都, 这样一个三角;再往北走就是缅甸老的首都曼德勒这里还有一个三角, 这两个三角将会决定整个缅甸的经济、社会战略发展前景如何。我说你如果笼统的只去学深圳,你怎么学,那是没有意义的。

魏部长:所以我认为十八大以后,可能不仅要出一些具体改革,比如财税改革,政治改革也开始了,将会对我们的机制、体制,围绕百姓民生这一块具体怎么做,他会有更多的战略推进。

管教授:就是把原定上海自贸区的地方性自贸区提升为国家级的自贸区;而且不再是保税区的简单加总,是一个全方位、多视角的一次资源配置的革命的改革。这个改革其实是美国人先“将军”干起来的,咱们是美国人“逼着干”的。美国人说投资要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我们都怕上美国人的当,但实际上对我们大大地有利。不过,反过来讲对我们带垄断性国有企业非常地不利,这把它们们的特权拿掉了。而且“法无禁止即自由”,这是对企业,对于民众来讲的,这可以大大释放人的创造力。反过来讲,对政府、对管理机构就是“法无授权即禁止”, 没有授权给你,你不能干预、干涉别人,这里真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才是它的重大战略意义,这个才是有全局意义的,不仅仅是一个具体领域比如金融、财税、人力资源等等方面。当然,这些都十分重要,但是它的根本理念、根本战略思维,是一场具引擎性的深水区改革、创新的革命。

这也就是说, 我们的改革开放正在进入一个同以前大为不同的新阶段, 这个“新”,“新”在内在逻辑。原先就在靠资源,靠优惠政策来推动;现在尤其要靠制度,靠制度创新来解决,根本的内在逻辑大变化了。

魏部长:所以对我们来说,研究自贸区的出现有更多的好处。现在中国社会、中国经济发展到现今这个阶段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是继续延长我们前三十年那种拼资源、拼劳动力成本、拼污染、拼消耗,重在 GDP;还是

通过一种卓越的创新, 改变我们目前现有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走一条科技创新的道路来提升我们国家整个的经济实力呢? 这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刻。大家都知道雾霾,这是最典型的难题。气候是产生雾霾一部分原因,但也有一部分是我们人为造成的, 烧高炉、炼铁,还有我们治理污染不得力等等。这个现象以前英国也有,但是人家已经治理了。大家都盼望着今天有个好的天气, 对身体健康也好。其实好多外国人也在看我们走的这条路子,我们如果走得好,那是真正成功的中国模式;如果你走得不好,那该怎么办呢? 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美国模式这种东西它不会持久的,美国这种“民主”是虚假的。尤其最近“棱镜”、“监测门”这个事件,再加上美国的债务上限、预算、倒闭,两党在国会吵个不停,它已经没有更多的动力。我们以前总觉得美国这样好那样好,美国政策其实不行。它有没有好处,也有好处,比如说创新的环境,你要说它一无是处也不客观,你要说它一切都很好,这当然也不对。大家以前相对比较一致——从前总有人说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月亮圆,但是现在慢慢的人们觉得,美国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行的。这才是客观,才是符合事实。但是既然要符合客观事实,我们要看看自己,我们自己该怎么做呢? 我们还有哪些地方不足?我们还有哪些地方改正?特别是我们中国这个经济体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的地位,虽然是讲第二,但是好多技术创新、制度、体制需要得到改善。怎么使社会环境更适合人的发展,怎么培养出一批像诺贝尔奖项获得者一样水平的人才。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对医改、教育、住房这三块最有意见呢,就是在这

他山之石

FT 社评:行动比承诺更重要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领导人承诺推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有人甚至将这次会议与 1978 年举行的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在那次会议上,邓小平启动了市场化改革,为之后 35 年的超凡增长奠定了基础。

那么,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是否已经兑现了它的大胆承诺?乐观者们抓住了三中全会公报中的一个词——中共承诺今后让市场在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些乐观者愿意相信:中国确实正在进入一个经济自由化的新时代。

若对这个词进行大胆解读,这确实有可能带来一系列深远的改革。如果市场力量在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释放,那么人们便可以想象:中国的价格和利率将会实现自由

一个地方以前改革力度小。过去对对外经济这一块改的力度就特别大, 很快就把过去的页翻过去了, 现在所有的人都可以进行对外贸易。我记得那时候万客隆这家超市刚进入我们北京的时候,店大得很。当时有人说像王府井这些我们自己的百货商店怎么弄啊? 营业员就业怎么解决?这怎么竞争?后来我们想通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消费者得益,让人民得益,如果减少中间环节那不是更好吗? 万客隆他们说试一试, 试一试果然马上就成功了,现在不仅万客隆办得很好,我们自己的大百货也没有受到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引进国外企业,要把它好的一面,开放的、创新的,有利于社会管理的,有利于老百姓增强福利的东西引进来,而把那些不好的、不适合我们的东西排除掉。就像当初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像我们当初中国改革开放那样, 尽量地多吸收一些国外更好的东西来壮大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像毛主席讲的那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点我觉得是关键。到了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如果我们仍然不前进——像美国还抱着冷战思维,所以总是转不过来,这是美国一百多年甚至两百多年的资本主义长期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结果。美国现在就很危险,它也处在十字路口,它如果能“转”,也可能转变得比较好, 转换不了那可真就变成列宁讲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垂死的最后的阶段”了。

管教授:美国现在很大的问题在于“寅吃卯粮”,甚至依仗着手中的印钞机和美元的某种特权地位,一再 QE,原来是“寅吃卯粮”,现在更进一步,成了“我吃你(全世界)粮”;同时,过分强调金融,过分“杠杆化”,导致把实体经济搞垮。这是很严重的,金融崇拜,去杠杆和加杠杆,杠杆用得太多。

魏部长:所以我建议你们《经济学家周报》要组织经济学家们多研究这一块。

管教授:我们总的打算是探索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或叫中国版本,从这个侧面来切入。大家都盼望今天有个好的天气, 对身体健康也好。其实好多外国人也在看我们走的这条路子,我们如果走得好,那是真正成功的中国模式;如果你走得不好,那该怎么办呢? 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美国模式这种东西它不会持久的,美国这种“民主”是虚假的。尤其最近“棱镜”、“监测门”这个事件,再加上美国的债务上限、预算、倒闭,两党在国会吵个不停,它已经没有更多的动力。我们以前总觉得美国这样好那样好,美国政策其实不行。它有没有好处,也有好处,比如说创新的环境,你要说它一无是处也不客观,你要说它一切都很好,这当然也不对。大家以前相对比较一致——从前总有人说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月亮圆,但是现在慢慢的人们觉得,美国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行的。这才是客观,才是符合事实。但是既然要符合客观事实,我们要看看自己,我们自己该怎么做呢? 我们还有哪些地方不足?我们还有哪些地方改正?特别是我们中国这个经济体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的地位,虽然是讲第二,但是好多技术创新、制度、体制需要得到改善。怎么使社会环境更适合人的发展,怎么培养出一批像诺贝尔奖项获得者一样水平的人才。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对医改、教育、住房这三块最有意见呢,就是在这

魏部长:从中华民族的历史看,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包容的时候,海纳百川的时候,我们才有最大的发展。比如说唐代,以及明代开始的时候。明代后来就不行了, 逐渐走向封闭,闭关锁国,这对于国家,对于地区都不行。所以有些时候一些小国它抓住机遇也能上去,比如瑞典、爱尔兰、挪威,他们就是在历史的机遇中及时地抓住了,他们一样成功了,他们以前也是游牧民族,也是以农业为主的,现在成了欧洲的 GDP 前几名。

从总体来看,我个人认为,下一步三中全会开了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政策(现在这个“三八三”也在出台)出台,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比这个范围更广的改革、力度更大的改革出台 (完)

化,人民币最终可以完全兑换,中国国有企业的角色也将受到大幅度的限制。

然而,三中全会公报并未提到上述改革中的任何一项。公报没有明确提到金融行业改革,也没有直接提及“户口”制度改革。中国的“户口”制度使许多迁居城市的农村居民沦为二等公民。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承诺具有潜在的深远影响。但是,三中全会公报的某些内容,似乎与今后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例如,“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个承诺似乎表明,国企的角色将得到保护,甚至还有可能扩大。

值得记住的是, 即便在邓小平 1978 年主持召开具有突破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也是过了很多年后才意识到那次会议的历史意义有多么重大。习近平计划的历史意义也可能需要时间才能显现。

但是,迅速落实某些措施,例如允许农民出售或抵押土地, 或者放开能源价格,将至少表明他的改革决心。实质性的国企改革尽管难度更大,但也将产生更大的影响。过去的 35 年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也扭转了普通中国人的人生前景。如果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想让未来的 10 年也同样成就不凡,他们就需要言行一致:拿出真正果断的行动,来兑现有关经济自由化的承诺。

(FT 中文网)